

平心静论“八一三”

马振犊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数年来有关“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问题所缺重点史料的发掘,欲彻底搞清楚那份至关重要的“8·20”中方最高统帅部发布的作战令的真伪问题,以及它对“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评价的影响,并针对种种的不同观点,进行深入的再探讨,并以心平气和及尽量客观公正的观点与态度,对“八一三淞沪战役”的起因问题作出新的评价。即“八一三战役”“引敌南下”改变日军侵华路线是中方战略意图,但它只是一种在战前设想的并被后来战争实际所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意识,而不是一份曾经公布过的作战方案。

关键词 淞沪战役 引敌南下战略意图

有关1937年中国军队发起“八一三淞沪战役”战略意图及其作用问题之讨论,沸沸扬扬已经进行了数年之久,关键的分歧在于中方发动此役有无“引敌南下”的战略意图之争。辩论双方引据同样的一些史料但观点各异,主要表现为:1. 对现有史料的理解分析不同;2. 对某些关键史料可靠性的认识有分歧;3. 对有关档案史料缺乏的原因理解各异。当然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知错必改从善如流的作风,这些分歧完全是可以通过相互交流共同探讨而渐趋一致的。鉴于对此问题的讨论已充分地展开,其史实背景也已有了清楚的介绍,本文中不拟重复叙述,只想就

“八一三淞沪战役”中的几个热点问题,阐述个人的一些新的见解如后,欲使之最大限度地符合有关历史的真相,从而对有关“八一三淞沪战役”的起因及其意义的评价之争论,有一个比较完满的结束。是否能达成这一目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 关于“八一三战役”我方军事战略目的的再认定

中方主动发起“八一三淞沪战役”,自然有其军事、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目的。但就军事战略目的而言,我方在上海作战的战略意图究竟为何?作为否定“引敌南下”论的代表性作品,《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和作战方针论析》^①一文论述说:“淞沪之战确有吸引敌军兵力、牵制敌军在华北的进攻,打乱其预定计划的意图和目的。但是说当时蒋介石已经设定了改变日军作战方向……的战略谋算……并无任何事实根据。”^②此种观点似有结论过早之嫌。就该文中所引据的史料看,蒋介石曾在1938年1月11日的开封军事会议上说:“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的华北。”^③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所谓“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的华北”其实际的含意是什么?难道仅仅是限于“吸引”、“牵制敌军吗”?退一步言,“吸引”敌军转攻上海是手段呢还是目的?前文的观点认为是手段,也就是说,上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华北战场的抗战。但我们根据开战前几

①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第26—44页。

② 同上出处。第29页。

③ 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载《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2册,第554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年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江流域经营国防准备的多种设想与努力及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蒋百里、德国军事顾问团长法肯豪森(Falkenhäusen)明确提议“以长江流域为未来抗日战争之主战场”,联系蒋介石当时尚未有效控制华北地区的历史背景等多种原因综合分析^①,我们依然可以认为,中方要“打破敌人的战略”,必须就要“引敌南下”,它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目的,而不是为了实现其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否则中方为何要早早地把最精锐的德式装备的部队部署在华东?

二 中方建立西南抗日基地的准备 与“引敌南下”战略的关系

持否定论的文章认为,中方建立西南抗日基地的准备与“引敌南下”战略间并无直接的关系,“至今并无任何论据能够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想以四川和西南为抗战基地的构想来证明蒋介石作出过引敌南下西进的决策,是没有说服力的”。对此,我们只要再回顾一下蒋纬国的一段回忆便可有结论。

蒋纬国在《中日战争之战略评析》一书中曾记载到,“八一三战役”开始前,蒋介石明确地说过:“这一战打起来,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是因为我在日本读书时的老师,如今都身担大任,日本人对中国战略战史的研究有时比中国人还深刻。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这是当年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广西一抄,我们即便保

^① 请参见拙著《开辟淞沪战场有无“引敌南下”战略意图》,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守南京、上海,这个仗也打不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他沿江西上,届时他就败了。”^①由此分析,中方上海作战与建立“四川基地”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不是一目了然之事吗?

三 中方“引敌南下”转移战略重心是主导还是被迫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对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一纸作战指导计划的真伪考定问题。

前引论文曾指出军委会“8·20”华东作战指导计划“是一件以讹传讹的史料”,并以此为据指责有关的台湾学者作伪,导致这份史料“严重的失实,在方法上是以结果演绎原因,导致其结论与历史事实相背离”。^②这一观点,遂成为持否定论者的观点支柱。

对上述看法,史学界早有质疑,认为其结论过于武断。经查考,该件史料出自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所编印的《抗日战史:全战争经过概要(三)》第255页。该指导计划全文如下:“国军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注意固守平绥路东段要地,最后确保山东、山西,力求争取时间,牵制消耗敌人。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军之登陆,或乘机歼灭之,并以最小限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至此,我们至少可以明白:1. 这段史料不是“何应钦1955年所作的……一种概述”,更不是台湾学者们的“以讹传讹”;2. 同时我们也认为,在大陆保存的民国档案中现在尚未发现这件史料的原稿及副本,但这并不是确

①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4册,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5版。

② 余子道:《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和作战方针论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第39页。

认其存在与否的唯一根据；3. 这件档案来自台湾的史料书，具体保存在何处，未见公布。

除此之外，需要解决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8·20”华东作战指导计划与同一天中方大本营所下达的关于华北战场的另两份作战命令《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战争指导方案》在内容上是否有矛盾的问题。

前引文认为在这两份“华北作战命令”中曾明确指出当时的“主战场在第一战区”，我方在第一、第二战区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坚守平绥路、南口、万全等地，使之“始终为国军保有”，以达成“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①的战略目的。这样一来，便与同日中方军委会下达的“华东作战指导计划”内容相左，因此可以反证后者的不真实。其实不然，只要我们细加分析便可明了，这几份作战方案并不是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而是各有所指各为所用的。

由于当时日军是在华北发动的战争，我方首先要对付华北日军的进攻而不可能弃之不顾，因此当时中方的抗战主战场客观上也只能在华北，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方不会另有所图，对华北我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只是即时性针对性的，我们可以视之为华北战场我方的应战方案。细细分析这两份文件，我们倒可发现，我方指挥当局在当时作为主战场的第一战区，采取的是较为被动的应战政策，在主战场侧背的第二战区，则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固守抵抗方针。前文中所谓的要使“敌决不敢冒险南下”的命令，则指的是蒋介石所讲的日军在占领华北后沿平汉线或津浦线自北向南的南下，而不是指被我沪战牵引空海运到华东战场的南下。对于这一点，当时中方的前线主将之一的陈诚，有下面精彩的说明：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我以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①陈诚的这段说明再次证明了“引敌南下”是我方主动的战略设计,而体现这一设计的便是那份军委会“8·20”华东作战指导计划。

仅从作战指挥方针上来看,与在北方的决策相比,南京当局似乎更积极致力于淞沪第三战区的作战指导。尽管在本战区“作战指导方针”中并未明书以“引敌南下”,改变其战略路线为目的,但在实际上是贯彻实施了这一方针。“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②，“迅速围歼上海市附近之敌人,并打破其沿海沿江登陆之企图”。^③同时,在8月20日中方下达的几份作战令中都明确规定,全部海空军力量投入上海战场,协同陆军即将发动的攻击作战。^④

以上事实说明,中方在“8·20”时,对北方采取的是应战抵抗;对淞沪采取的是出击制敌。

南京国民政府要在长江一线摆开对日战场的设想并非一时的

①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第9—10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②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第5页。

③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抗日战史》淞沪会战(一),第9页,“我军作战指导”。

④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第13页。

仓促决定。早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7月30日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主持了军事长官会报第20次会议,通过了8项决议,其中就包括了:对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之应付计划;对汉口日租界之扫荡计划;长江中下游各要塞之阻塞及对日舰之扫荡计划^①等等,这些决议充分说明了当局在长江一线开战的战略意图,它与南京政府多年来在宁沪间修筑三道国防战线、制定歼灭汉口日租界计划、经营武汉国防中心以及在西南筹建“最后根据地”的设想是一脉相承的。

8月11日下午,在何应钦主持的另一次会议上,与会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将领发表了他们对我方抗战战略的看法。尽管当时中共的军队都在北方战场,但朱德说:“第一第二战区为主战区,兵力已有相当多,但仍须准备兵力于该两战区,因敌必不以大兵在他方策动也。故在长江上海占先制,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各方面之胜利而巩固主战场之胜利。”^②叶剑英也发表了讲话,他不赞成在上海大打,认为“我之重点在上海,虽胜利不能转移全局,如在平绥线置重点则可转移全战局,而破坏敌人整个计划”。^③朱德、叶剑英的这番话,可从侧面与反面证明,当时在会议上确实讨论了在上海开战“引敌南下”的战略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战前已经制定好的“一旦开战三战区即以全力先围攻上海之敌。以屏障首都”的作战计划^④,南京政府于8月11日下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等精锐部队,开始总攻上海日军据点,打响了“八一三淞沪战役”。

① 《卢沟桥事件第20次会报》,载《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第14页。

② 《8月11日下午四时谈话会》,载《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第21页。

③ 同上,第22页。

④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第6页。

这次战役的战术目标是围歼淞沪日军,而后封锁海岸拒止日军登陆;其所宣示的战略目标是“巩固首都及保有经济策源地”。尽管我们从多方资料中可以考察出“八一三战役”的战略目标绝不止于此,但从现有档案史料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在1937年8月中旬时,中方尚没有宣示出明确的“引敌南下”的战略计划,但无论如何,“八一三战役”在开始阶段就是有其战略意图的,并不是“走一步看一步”,更不能说其“作战指导方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①

战事开始后不到一周,蒋介石派陈诚赴淞沪视察,于是就有了以前多次引用过的陈诚向蒋建议“扩大沪战”以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的情况,和蒋介石“一定打”的决策。^②尽管我们现在对陈诚的建议本身存在着见仁见智的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陈诚建议的含意就是引敌主力南下,破坏其“自北而南”的侵略计划,而不仅仅是为了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③其后,陈诚便奉命率十五集团军赴沪增援^④,上海战事便逐步扩大成为中日的主战场。

8月20日蒋介石的决策及当日军委会下达的作战指导计划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到8月20日后,中方已经有了明确的在上海扩大战事“引敌南下”的决定及其实际行动。其目的是为了使其日军主力从华北转移到淞沪,在客观上造成其只能沿长江“由东向西”进攻的结果。对于这一点,蒋介石没有说,但他做了。从“8·13”到“8·20”,短短的一周时间内,中方作出了在上海大打的决定与布置,如果没有战前的充分思想准备,如此迅速果断的决策是

①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第35页。

②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第14页。

③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第37页。

④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第14页。

极难想象和解释的。

果然，在中方的激战之下，到8月底，上海日军陷入了困境，日军参谋本部鉴于日军在淞沪战场的伤亡数已达华北战场的两倍。且“打开上海方面的悲惨状况”陷入“苦战”，于是决定向上海大举增兵，加派3个师团1个旅团及空军来沪参战。9月中旬，日军在沪兵力已达陆军5个师团15个大队12万人。9月6日，我方“大本营情报”载：“当初东京计划，决以第三舰队在华南各海口为牵制动作，待华北军事发展，后以陆战队屡战屡败，南口相持不下，乃不得不变更战略，侧重沪战……敌前日续到援军2个师团，昨日多加入作战，双方死伤均巨，明日尚有2个师团到沪，主力战必在8日午前。”^①11日，军委会第一作战组又获情报：“日军参谋本部对华战略有所变更，因我方在上海一带兵力雄厚，不易得手，拟在大批援军开沪后下总攻击令。”^②这说明日方在9月中旬已将侵华战略做了变更，将淞沪作为其侵华战争的主战场。

对于淞沪主战场的具体形成日期是9月还是10月中旬的问题，我以为不必过分计较，其关键是淞沪最终成为了中日的主战场，时间的早晚并不影响对我方战略设计的评价。

四 “引敌南下”战略的相关史料再证明

曾有观点认为，沪战“引敌南下”战略不成立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缺少当时决策者及参与军机人士的个人记录及其回忆资料，但实际上仅就蒋介石而言，便有比较完整的系统资料说明他的这一思想的存在与形成过程。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第271页、第273页。

②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第273页。

1934 年 4 月底,蒋介石在庐山与来华访问的德军名将塞克特(Seeckt)讨论中国对日国防战略时,有过以下一段论述。蒋介石主张对日国防重点区域应在长江流域而不在华北。他对塞将军说,一旦中日开战,他准备在必要时放弃华北而集中全部力量保卫长江流域,所以“抗日之发动必须在江西剿共之后”,“蒋对华北感到悲观,他说自己未能控制住黄河以北地区,而北方军无用,不同于南方军队,陇海线以北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甚至不知道日本人是敌人”,所以,“为了替代北方防守,蒋说要不惜代价建设强化据点”,“他决定只有 16% 的军事预算可用于华北,因而那里只能选择战略要点构筑国防工事”,“他又表示从政治上来看,长江以南远比长江以北地区重要,况且华北的地方实力派军队没有任何军事价值”。^①

1935 年 7 月,蒋介石又一次明确提出:“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以甘肃、云南为后方。”^②

1936 年 7 月,蒋介石在接见即将离任的英籍财政顾问李滋罗斯时对他说:“对日抗战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

① 德国联邦军事档案馆藏:《塞克特与蒋介石会谈记录》(1934 年 5 月 4 日),No: 02-4415, p. 207。

② 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第 4 卷,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4 年版,第 211 页。

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①

其后，蒋介石又在中日开战之初，有过本文前引之“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他沿江西上，届时他就败了”这一段论证。

“八一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1938年11月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说：“在去年平津失陷的时候，我们不能将全国所有的部队调到华北去与敌人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而要将我们主力部队，作机动的使用，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一定先要诱他到长江流域来……孙子兵法上说：‘凡先处于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我们能诱敌深入……完全是以逸待劳步步致敌而不为敌所致。”^②

当时参与军机的中方军委会作战部部长黄绍 也曾回忆到：“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说日本是被动的，我国是主动的，最高统帅的决策，是要以主动的姿态，先把上海的敌军根据地摧毁……即使不能把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搅乱其既定的计划。”^③

以上所引证的蒋介石在战前战后的一系列的讲话及黄绍 的回忆都可作为“八一三战役”之“引敌南下”战略意图的证据，至此所谓当年“参与军事机密的主要将领都未说过有这样的一个重大决策”^④之说可视为并不符合实际。

① 蒋纬国：《中日战争战略评析》，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4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5版，第10页。

② 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载《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3册，第454—455页。

③ 《黄绍 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④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第31页。

五 几点最后的结论

关于“八一三战役”“引敌南下”战略是否存在及如何评价的问题,我以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及研究结果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八一三战役”是存在“引敌南下”、“改变日军侵华路线从由北向南到由东向西”的战略目的的,有许多史料可对此加以证实。如蒋介石、陈诚、法肯豪森等人的讲话及书面建议、报告;南京国民政府经营宁沪汉川国防线与国防基地的行为;设计湘赣“国防中心区”的计划;修筑浙赣铁路线;“图川”及建设西南大后方等等战略措施。如果根本否认了这一战略构想的存在,那么上述这些史实将无从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七七事变后,日本军方的企图是在华北战场一举击溃或围歼中方主力。以达成速战速决逼降中国的目的。而中方则依据战前的设想,决心与日本开展持久战。实行这一战略的第一步就是主动发起“八一三淞沪战役”以打破日本战略企图。因此,从全盘战局分析,中方不可能按照日方的意图,把主力开往华北去与日军决战。这一思想在“七七”之后我方对于华北战局的作战指导方针中已有明确的宣示。8月前后的华北主战场是由日本侵略造成的客观存在,不是中方的选择;而9月以后的华东主战场才是中方的选择。试图用8月之前我方指挥华北主战场战事的文件来证明9月以后华东不是中日主战场,这从逻辑上来说也是不通的。“八一三淞沪抗日之役”是我方实施“持久抗战”战略的一个开始。

(三)依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料考察与分析,从“七七”到“八一三”,中方具体的应战方法客观上来看应当说是存在着一个变化的过程的。由于战事的突然爆发及华北地方实力派对与日和谈存在着幻想,开战之后,中方一面应战,一面忙于协调内部,期望能够一

致对外。南京中央召开最高军事长官会报,研讨对敌抵抗方针,会上各方将领提出了许多意见,会议记录也并不完全。许多极具价值的提案甚至没能记录,如有关将四川划入第一战区的提议便是如此。^① 在这种情况下,若以未见到正式文件为唯一的理由便轻率根本否定中方有“引敌南下”的战略思想,似觉过于草率武断。

(四) 最后,我们在肯定“引敌南下”的战略设计的同时,必须申明的是,我个人从未说过“引敌南下”是蒋介石在战前就早已设计好了的作战计划。^② 我在《开辟淞沪战场有无“引敌南下”战略意图》一文中的原话是“这足证蒋氏集中兵力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是有充分设计的”^③,意即指“八一三战役”是有充分设计的,而不是特指“引敌南下”。我认为,“引敌南下”一直是一种盘旋于蒋介石等人脑际的战略思想,而不是一项已经明确的可以公布示人的战略计划。由于开战后中方没能实现“赶敌下海封锁海岸”的预案,上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此时因为中方最高领导层早已有了要把日军引来长江流域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设计,故而自然地便产生了陈诚的建议与蒋介石的大打决定。至此,沪战便具有了“引敌南下”的战略含意。“引敌南下”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使日军分兵以支援华北战场我军的作战,而直接是为了改变日军“自北向南”的侵华路线,其客观结果便是吸引日军主力到华东,使其进兵路线一变而成为“由东向西”。对于这一设计与结果,蒋介石等中方指挥者,说了也做了,只不过没有高度概括为前述“八个字”而已。

总而言之,“八一三战役”“引敌南下”改变日军侵华路线是中

① 《8月11日下午四时谈话会》朱德讲话中“四川划入第一战区不相宜”等内容,载《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第22页。

②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第35页。

③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第214页。

方的战略意图,但它只是一种在战前设想的并被后来战争实际所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意识,而不是一份曾经公布过的作战方案。这就是我的最后的结论。

(作者马振犊, 1961 年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刘兵)

《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中译本出版

该书由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韩国挺身队研究会编纂, 金镇烈、黄一兵翻译, 2001 年 1 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内容是 34 位当年的韩国“慰安妇”的回忆合集。通过“慰安妇”们的痛苦回忆, 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期间, 有计划地征集、运送和强迫妇女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的罪行。全书共 38 万字。